



辛亥革命史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深远历史变革。就在这一年，延续了两千多年的

君主专制制度轰然倒塌，一种新型的“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建立起来了。尽管这一制度当时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粗糙，但毕竟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了人心，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深远历史变革。就在这一年，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轰然倒塌，一种新型的“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建立起来了。尽管这一制度当时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粗糙，但毕竟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了人心，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朱育和
欧阳军喜
舒文 著

人民出版社

辛亥革命史

朱育和 欧阳军喜 舒文 著

装帧设计:尹凤阁

版式设计:诸晓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史/朱育和 欧阳军喜 舒文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

ISBN 7-01-003314-5

I. 辛…

II. ①朱… ②欧… ③舒…

III. 辛亥革命—研究

IV. K257.07

辛亥革命史

XINHAI GEMING SHI

朱育和 欧阳军喜 舒文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16.875

字数:410千字 印数:1—3,000册

ISBN 7-01-003314-5/K·660 定价:29.90元

前 言

谁也无法否认,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深远历史变革。就在这一年,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轰然倒塌,一种新型的、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建立起来了——尽管这一制度当时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粗糙,又是那样的名实不符,但毕竟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了人心,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对这场革命风暴意义的认识却远远不是一致的。可喜的是,到今天为止,史学界不仅对这场风暴本身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越来越深入和全面,而且对晚清维新运动的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也日趋完善,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特别是将辛亥革命与维新运动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从维新与革命、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研究辛亥革命。我们认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晚清最后十几年间,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维新运动、社会化趋势与民族主义建国思潮相激荡的产物,这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又规定和影响了辛亥革命的结局。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

(一)维新与革命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改良与革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救亡的前提下几乎同时出现的两种不同的救国主张。它们在要不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这一点上是有本质区别的,但两者之间又有许多相通之处。改良中包含着革命的因素,革命又涵盖了改良的内容,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改良是缓进

的革命,革命是激烈的改良,二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这是因为,甲午战后,“变”已经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议题,特别是康、梁变法活动失败后,人们的变革意识越来越强烈,它推动着统治者沿着变革的轨道向前滑行,一桩桩新事物萌生出来了。它与旧的社会母体越来越势不两立,于是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辛亥革命就是在清王朝统治阶层一次次自上而下的变法自强举措中步步逼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改良派的活动客观上推动了革命的进程。

(二)清王朝的覆灭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在最终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立宪派及一部分旧官僚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论者都已经指出过的。但是还有一点却常常为人忽视,这就是晚清社会化趋势,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进入 20 世纪后,一些新的公共领域,如商会、学会、教育会等出现了,公共领域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救济和慈善扩展到社会经济管理、社会教育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甚至延伸到立法和司法领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有相当权力和影响的重要的社会组成,这些领域的出现,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社会的秩序和根基,与后来的辛亥革命息息相关。

(三)辛亥革命的结局与民初的国民心理及袁世凯所代表的那种治国思想占优势有关。支持革命派不断奋斗的就是一种民族主义建国的理想和对民主共和的坚定信念。当民主共和制度宣布建立起来后,一种权威主义、国家主义的治国思想流传开来,国人普遍希望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现,迅速结束分裂、混乱的局面,以奠定共和国的基础,袁世凯便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袁世凯自晚清改革以来,就以开明务实著称。他所推崇的是德国式的富国强兵之路。这与孙中山所追求的美、法式的道路大异其趣。但袁世凯所主张的德国式治国方案极容易博得旧官僚、立宪派及一些声称稳健的革命党人的同情。因此他不但能获得北方各省的支持,而且也能获得南方一些省份的好感,事实上,当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

后,人们不是把他当做一个总统来接受,而是把他当做一种象征,乃至一种希望来接受。可以说,袁世凯的胜利是德国派治国思想在中国的胜利,袁世凯能取代孙中山当上总统以至于后来他又胆敢称帝,都与这种德国式治国思想占优势有关。

以上就是我们的一些粗浅认识,也是我们在本书中着力阐述的几个观点。跟随这些认识,我们走进历史,历史也向我们走来。

本书第一章由朱育和执笔,第二、三、四、五章由欧阳军喜执笔,第六章由欧阳军喜和舒文合作完成。全书由朱育和统稿。

作 者

1999年3月28日于清华园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山雨欲来	(1)
一 康、梁变法的失败	(2)
二 义和团运动	(10)
三 八国联军战争和《辛丑条约》	(19)
四 清廷“新政”	(28)
五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40)
六 两种矛盾的加剧	(46)
七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	(54)
八 民变蜂起	(62)
第二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	(75)
一 先行者	(75)
二 兴中会	(86)
三 乙未广州起义	(94)
四 孙中山伦敦被难	(104)
五 孙党与康党	(114)
六 惠州起义前后	(124)
七 在东京	(133)
八 在上海	(145)
九 章炳麟、邹容、陈天华	(154)
十 革命团体相继建立	(164)
第三章 中国同盟会	(174)

一	1905 年	(175)
二	孙中山的美洲之行	(186)
三	留欧学生的加盟	(197)
四	孙、黄会晤	(204)
五	中国同盟会之成立	(211)
六	民族、民权、民生	(220)
七	《民报》与《新民丛报》之论战	(233)
八	暗杀与起义	(247)
九	黄花岗之役	(259)
十	同盟会内部的分歧	(269)
第四章 武昌起义		(281)
一	新形势	(281)
二	战略重心北移	(290)
三	湖北革命力量的聚结	(299)
四	立宪派的动向	(307)
五	保路运动	(318)
六	武昌起义	(330)
七	湖北军政府的建立	(338)
八	武汉保卫战	(347)
第五章 清王朝的覆灭		(361)
一	各省响应(上)	(361)
二	各省响应(中)	(373)
三	各省响应(下)	(385)
四	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	(393)
五	新气象	(405)
六	危机	(413)
七	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	(422)
八	孙中山解职与临时政府北迁	(433)
第六章 共和:理想与现实		(442)

一	共和初年	(442)
二	内阁风波	(457)
三	宋案与善后大借款	(465)
四	二次革命	(476)
五	省制与宪法	(488)
六	国体问题	(497)
七	护国之役	(509)
八	新动向	(519)
后 记		(529)

第一章 山雨欲来

辛亥革命的风暴是在清王朝统治阶层一次次自上而下的变法自强举措之中步步逼近的。

到19世纪末,中国政局已是晚清时期,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帝国主义列强的步步进逼和国内民众愈演愈烈的造反声浪的双重打击,使此时清王朝病入膏肓,犹如一个患晚期癌症的老年病人一样。富有统治经验和善于玩弄政治权术的慈禧太后,看到了这一切。为了皇权、儒学地位、满族利益和她本人地位的不变,延长清朝统治寿命,她决定通过某些局部的、表层的缓进变革举措,来阻挠和防止深层的激进变革的发生。“变”是为了不变。洋务运动的发生,就是清朝统治权术这种新变化的开始。但是,只要一旦进入变革(哪怕是微小的变革)的历史轨道,往下的发展就由不得清朝统治者的意愿了。洋务运动之后不久,戊戌年出现了康、梁的激烈变革,而且得到光绪帝的支持,这大大出乎慈禧的意料之外。当她镇压了这种激烈变革之后,不到三年,慈禧本人竟不得不推出甚至比康、梁更为激进的“新政”变革,这是她更加没有想到的事。慈禧“新政”施行的结果,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发展,中央和地方、国家和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特别是涌现出了一个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一切意味着一场更激烈的变革,即革命的风暴已是山雨欲来了。晚清政局,就这样沿着从小变到大变,从缓变到激变,到更激变的轨道向前发展,迎来了辛亥革命的风暴。这种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变化发展,就是无情的历

史辩证法。

一 康、梁变法的失败

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事件,莫过于由康有为、梁启超所推动的戊戌变法运动了。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推动下,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随后光绪帝陆续发出一百多道新政诏书,一项项改革措施接连出台。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汰冗员,澄清吏治,广开言路;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产总局,开办实业,改革财政,奖励发明;文教方面,废八股,改试策论,开办京师大学堂,派人出国留学,设立译书局,准许自由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军事方面,设军工厂,编练新军等。然而,好景不长,变法很快遭到了来自慈禧太后方面的巨大压力。七月二十七日(9月12日)光绪帝还颁布上谕,剴切布告变法之意于天下,并令“所有关乎新政之谕旨,各省督抚,均迅速照录,刊刻誊黄,切实开导。着各州县教官详切宣讲,务令家喻户晓”^①。两天后则风云突变,光绪帝“密诏”杨锐:

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进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及,若强行之,朕位且不能保。尔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用英达,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奏,候朕审择,不胜焦虑之至!^②

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页。

② 《清史稿》,卷464,列传251。

此后,来自西太后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光绪帝只得密令康有为等迅速出走,以免不测,以图将来。终于八月六日(9月21日),政变发生,西太后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同时下令捕拿康有为、梁启超及与新政有关的维新志士,在所发捕拿康有为的谕令中,这样写道:

近因时事多艰,朝廷孜孜图治,力求变法自强。凡所施行,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朕忧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搆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①

说康有为要“劫持”西太后,谋害光绪帝,是“莫须有”的罪名,至于说他“学术乖僻”、“非圣无法”,倒反映出当时思想上新旧之争的实际情况。但无论如何康有为、梁启超是无法在国内呆下去了,只好亡命日本,而康广仁、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和林旭六人则先后被捕,不久遇害。全国上一时腥风血雨。

也就在政变发生当天,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告由她出来“训政”。为了坚决镇压这次超越允许范围的激进变法,必须矫“枉”过正,她一方面废除康、梁变法期间所施行的新政,一方面恢复被康、梁废除或已改变的旧政,“复八股,禁报馆,捕会社

^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46页。

及主笔人,罢经济特科、农工商局,复冗官,停漕折,务反其旧,凡昔所经营者,尽皆罢废”^①。结果——

自八月以来,朝局变更凡四五月,以后皇上所创制之新政,其尚未明言作废者,独铁路矿务总局及大学堂二事耳。……然则路矿局之设,亦不过徒留其虚名而已。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一举而已。然闻得礼部各堂官以及守旧诸臣,亦均不以此举为然,视学堂一事若赘疣。然推原其故,所以不能迳废者,盖因外洋各教习均已延订,势难中止,不能不勉强敷衍,以塞其口,以故在事诸人亦均无精打彩,意兴索然。^②

至于说为何要废除新政,恢复旧制,西太后是这样借光绪的名义来解释的:

朝廷振兴庶务,筹办一切新政,原为当此时局,冀为国家图富强,为吾民筹生计,并非好为变法,弃旧如遗,此朕不得已之苦衷,当为天下臣民所共谅。乃体察近日民情,颇觉惶惑。总缘有司奉行不善,未能仰体朕意,以致无识之徒妄相揣测,议论纷腾。即如裁并官缺一事,本为沙汰冗员,而外间不察,遂有以大更制度为请者。举此类推,将以讹传讹,伊于胡底?若不开诚宣示,诚恐胥动浮言,民气因之不靖,殊失朕力图自强之本意。所有现行新政中裁撤之詹事府等衙门,原议将应办之事,分别归并以省繁冗,现在详察情形,此减彼增,转多周折,不若悉仍其旧,着将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照常设立办事,毋庸裁并,其各省应行裁并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7页。

②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7—1248页。

局所冗员,仍着各该督抚认真裁汰。至于办时务官报及准令士民上书,原以寓明目达聪之用,惟现在朝廷广开言路,内外臣工条陈时政者言苟可采,无不立见施行,而疏章竞进,辄多摭拾浮词,雷同附和,甚至语涉荒诞,殊多庞杂。嗣后凡有言责之员自应各抒谏论,以达民隐而宣国是,其余不应奏事人员概不准擅递封章,以符定制。《时务官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并着即行裁撤。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着该地方官察酌情形听民自便。其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祀,着一仍其旧,毋庸改为学堂,致于民情不便^①。

康、梁亡命日本,“六君子”被杀,新政措施被废除,从这意义上说,由康、梁推动的这场变法运动失败了。导致此次政变发生和变法失败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学术之争,又有变法所牵涉到的人事之争,但更重要的是,与康、梁在推进变法时的方式方法有关。此次变法的重点在改革官制,这势必触动一些当权者的利益,若不注意策略,过快过急,势必引起反动。

康、梁变法的失败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后果,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国人“变革”意识不是消沉而是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形式虽然失败了,但变法的精神却流传了下来。并且日益深入人心,从这意义上说康、梁变法没有失败。梁启超指出:“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则殊多缺点。殆犹大辂之仅有椎轮,木植之始见萌坼也。当时举国人士,能知欧美政治大原者,既无几人,且掣肘百端,求此失彼,而其主动者,亦未能游西域读西书,故其措置不能尽其当,殆势使然,不足为讳也。若其精神,则纯以国民公利公益为主,务在养一国之才,更一国之政,采一国之意,办一国之事,盖

^①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73页。

立国之大原,于是乎在。精神既立,则形式随之而进,虽有不备,不忧其后之不改良也,此戊戌维新之真相也”^①。梁启超是变法活动的主要人物之一,此番议论,十分中肯。

维新变法的精神即使在统治集团内也并未消失。这是因为,“变”是甲午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统治集团中的主要人物都在经历了甲午战败的惨痛之后开始严肃思考“变”的问题,有的当权者已经意识到,只有变法才能图存,不变则毫无出路。应该说,处于统治集团核心地位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有变革的迫切愿望。但他们所希冀的变法与康梁所追求的目标是有原则区别的。无疑,康、梁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希望从官制改革和人事变革入手,进而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对这种“改制”倾向,慈禧自然本能地表现出一种警惕和反对态度。但她也并不一味反对任何变革,而是希望在现有体制允许的范围内变法。事实上,在康、梁事发之后,朝廷仍纷令讲求农工商务,京师大学堂也仍如前议,各省之裁汰冗员也无人复官。因此,本质上讲,维新变法运动期间两派的斗争,并不是“变”与“不变”的斗争,而是谁来变,怎么变以及变什么的分歧。所以,西太后虽然镇压了康、梁的变法运动,但却并没有也不可能挡住“变法”的前进道路。“变法”仍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悄悄地进行。

从普通民众一方面来说,康、梁变法的失败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政治热情。使人们更迫切地感到改革的需要。这一点,连国外的观察家也注意到了。政变后不久,一名外国记者这样写道:

不过,中国的维新运动并不是这样就消灭了。……维新运动从来就没有依靠过皇帝来取得成功,因此也决不会因为

^① 梁启超:《康有为传》,转引自《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43—244页。

皇帝的缺席而全然失败。他的胜利是肯定的,因为他是中国人所需要的。光绪所颁布的少数诏令,当然具有促进他的力量,而现在太后所发的反动诏令最多也不过起一点稽迟的作用。真实的工作,是依靠全国人民来推行的,诏令一类的东西既不能完成他,也不能破坏他。战争和赔款迫使中国人民相信他们之所以不如日本,是因为日本采用了新法,所以有今日的强盛。他们是不甘于长处于劣势之中的,必然会为自己获得这种新力量的泉源。……中国的商人阶级是在保守政策与贪官污吏之下受害最深的,因此要求改革的愿望极其强烈。知识分子现在也同样具有改革的愿望,他们大胆的用书籍与小册子一类的东西来倡导它,工人们,由于无知的原故,还漠不关心,但他们都希望较高的工资,所以是很容易争取的。总之,在现在这种重负之下,全国都是骚动的,希望改革的。对国事漠不关心的时代是过去了!①

可见,“变法”的思想在康、梁变法失败后继续蔓延,已经普及到商人、知识分子和工人中去了,而且更为强烈。

康、梁变法失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启蒙思想的迅速传播,从而为后来的革命播下了火种。戊戌变法前,康、梁也曾做过理论准备。但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主要出自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书,他所依赖的依然是传统的学术形式,这表明他对用西学来进行启蒙的认识还不够自觉。变法失败后,维新派总结经验,终于认识到,“变法不变本原,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②。这里所说的“本原”,就是维新派常说的“民智

①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155—1156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神州国光社出版,第293页。

民力民德”。在他们看来,强国必须从培养造就“新民”做起,于是他们的工作重点便转向开展社会启蒙上来。康、梁流亡到日本后,便创办了《清议报》,继续宣传他们的维新变法主张,同时进行思想启蒙。该报于1898年12月23日正式出版,1901年底终刊,前后历时三年,共出一百册。

《清议报》的宗旨,就是“主持清议,开发民智”^①。它所说的“主持清议”,就是指猛烈抨击西太后主持下的朝政,鼓吹“尊皇”、“保皇”;它所说的“开发民智”,就是指介绍并鼓吹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进行思想启蒙。关于《清议报》的特点,梁启超作了如下概括:

《清议报》之特色有数端。一曰倡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二曰衍哲理,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虽不敢自谓有所得,而得寸则贡寸焉,得尺则贡尺焉,华严经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以是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三曰明朝局,戊戌之政变,己亥之立嗣、庚子之纵团,其中阴谋毒手病国殃民,本报发微阐幽得其真相,指斥权奸一无假借。四曰厉国耻,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②。

梁启超把“倡民权”作为《清议报》的首要特色并不为过。资产

① 《本报改定章程告白》,《清议报》第11册,1899年4月10日。

② 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8—49页。